

从实际上的从属到算法剩余价值

——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剩余价值

蓝江

【摘要】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数字资本究竟从何处获得利润,数字劳动何以为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提供剩余价值。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实际上的从属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也让我们理解工人的身体以能量或劳动力的方式依附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身体被贬低为纯粹的能量储存器,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联合成为具有生产出“机器剩余价值”的机器,而机器反过来奴役了身体,让工人身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物质机器已经被无形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所取代,但算法机器奴役的不再是工人的身体,而是广大被数字化的用户。这样,物质性机器剩余价值概念逐渐变成了无形的算法剩余价值概念。

【关键词】实际上的从属;机器奴役;算法剩余价值;数字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蓝江(1977-),男,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杰出青年社科人才,从事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研究(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学术交流》(哈尔滨),2023.11.29~4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研究”(23ZX-ZA014)。

因此,任何物体都不可能归于无。不仅如此,相同的力量和原因也能够消灭万物,若不是永恒的物质彼此连接,嵌在或松或紧的层层网络里。^[1]

——卢克莱修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也生活在一个智能化的时代。今天,当ChatGPT、LLama、I-JEPA等通用大语言模型和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品横空出世的时候,在沉闷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如同列缺霹雳,丘峦崩摧,震撼了那些被裹挟在数字资本主义茧房中的生命。在更有效率、也更为智能的通用语言大模型,以及未来更发达的人工智能产品面前,这个世界是否还有人类劳动的栖息之地?我们如何看待今天逐渐被人工智能产品蚕食,如何看待逐渐将人类赶出劳动边缘的智能平台和云计算技术?人类

本身的劳动是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还具有价值?我们又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去面对更为智能化的未来社会?

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的方式来作解答。正如开头的卢克莱修《物性论》的诗句一样,我们需要看到的不是单个人的存在方式,也不是某个个体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而是需要看到所有的人或物,就像卢克莱修描述的那样,正在“嵌在或松或紧的层层网络里”。与之相反,或许那种单纯从个体劳动者,从资本家-个体的工人阶级之间的雇佣关系来思考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的方式,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或松或紧的层层网络里”的数字劳动变得资本化的平台。这一平台不再剥削某个具体的劳动者,而

是将这些劳动者转化为一个庞大的网络机器,平台从这样的巨大的机器的运转中来汲取剩余价值,个体与这些价值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于20世纪的思想家们留下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是需要新的智能社会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重新来发明一系列新的概念,作为今天思考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及其生产关系的基石。

一、实际上的从属:剩余价值的生命政治之维

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十分清楚,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也为《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找到资本主义社会背后隐藏的剥削和压迫的奥秘,找到一个阿里阿德涅之线。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用十分清晰的逻辑和话语,描述了剩余价值的来历和本质:

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1]

在概念上,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界定为超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工资的货币等价额的部分,超出这个等价额的劳动时间,自然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资本家的利润的奥秘就是源于此。不过,在通常的理解之外,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引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点:

(1)正是在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来

自机器、厂房和其他的原材料和消耗品。在市场上,这些不变资本购买的价值和转化为工厂产品的价值,并不会产生巨大的变化(除非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波动或发生经济危机等等)。在相对平稳的市场环境下,不变资本是保持不变的。在一定程度上,后来由自动化技术和电子化技术所催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不变资本的革命。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带来规模效应,从而挤压其他产能落后的国家和工厂,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变资本才能带来巨大的利润。那么,与之类似,今天我们经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革命,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不变资本的范畴,也就是说,无论生产平台如何智能化和数字化,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只能源自可变资本,即资本家可以从工人和其他雇佣劳动者身上的压榨活劳动和剥削超额的劳动量来实现。在当今的生产环境下,无论如何智能化,实际上都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事实——今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必然是人,而不是机器,也不是人工智能,除非人工智能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活劳动,变成了可变资本。

(2)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工人何以愿意在剩余劳动时间去继续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即对工人和其他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进行榨取和剥削,已经不再是奥秘。工人通过工会等组织主张自己的权利,如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薪酬、改善工作环境,但这些举措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在有工会的情况下,工人仍然十分乐意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为什么会如此?工人是否可以在完成了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内的工作之后,就不再为资本家打工,让资本家无法榨取剩余价值,这样工人不就得到了解放?但是马克思逝世后的工人运动史充分说明,工人实际上没有选择,他们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而独立生活,即便不受甲资本家的剥削,他们也会进入到另一家工厂受到乙或丙资本家的剥削,只要整个市民社会的

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人就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整个资本世界生产维持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权力和奢靡生活的剩余价值。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从政治角度剖析了资产阶级利用经济工具来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奥秘,这个奥秘不仅从量上无偿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且从性质上形成了对工人或无产阶级的永恒奴役。为此,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之前的手稿过程中,提出了两个概念,即形式上的从属(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上的从属(real subsumption)。

形式上的从属,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通过某种具体形式(在市民社会中表现为货币形式),让工人或无产阶级与特定的资本家发生关系。在形式上的从属之前,工人与资本家并不表现为资本家-工人关系。在雇佣之前,工人的名称并不是工人,因为那时他可能是失地农民、堕落的中产、流氓无产者或者其他名字,唯有当他接受了资本家的雇佣,通过协议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才真正获得了一个名称——“工人”。如同精神分析中的询唤(interpellation),时时刻刻警告着劳动的人们,一旦选择了去拿薪酬(月薪、年薪、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等),他们就是工人或雇佣劳动者,而且必须以卑微的身份面对那些给他们工资的老板。这就是最简单的从属关系。当然,一旦工人不再获取工资,这种雇佣关系或从属关系就会解除,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从属关系高度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薪酬体系,是一种货币交换形式下的雇佣或从属关系,我们自然可以将其定义为形式上的从属。

既然形式上的从属是一种以货币薪酬关系为基础的从属,这种从属关系也仅仅体现在雇佣劳动过程之中,那么问题是,工人是否可以不依赖于这种薪酬关系,进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中逃逸?答案是不能,因为在马克思的叙述中,除了形式上的从属,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从属关系——实际

上的从属。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确是在讲述超额剩余价值的部分时谈到了“实际上的从属”,但马克思注意到,在这个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关系的革命中,个体的孤立生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当工人辞职,不再依附于工厂和大公司体系,自己创业搞个小作坊、小商店、烧烤摊时,发现自己选择的个体化劳动方式,早就被高科技化、自动化甚至高度垄断化的大资本集团挤压得没有生存空间。他们的小作坊中生产出来的商品,与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化生产出来的商品相比完全没有竞争力;自己开的小餐饮店,受到那些外卖平台和美食平台的系统挤压,也无法生存。最终,这些所谓逃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体化的生产,被不断挤压直至破产,让这些人不得不再次接受资本主义的雇佣协议,不得不再次变成他们从属关系下的附庸。这种从属,不再是形式上的从属,而是实际上的从属,意味着在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根本没有为个体化的小生产模式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个体若想活下去,只有一条道路,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让自己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因此,马克思用十分平稳的口吻说道:

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和重复的)革命。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我们以前所阐述的劳动过程本身中的一切变化都出现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了,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3]

这意味着,不是工人愿意自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让自己心甘情愿地任由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而是工人在资本主义不断科技化发展的生产体系之外,根本没有存活的立锥之地。于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个悖论式的循环,随着资本的自动化、电气化、数字化和数智化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及其效率的不断提高,工人不是越来越

越自由,而是越来越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就像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提到的技术加速产生的悖论,随着技术加速带来的巨大的动力,人们不是感到这些加速带来的解放,而是“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常常流逝殆尽,他们极度缺乏时间。时间仿佛像是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4]。这种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变得枯竭,感觉自己越来越忙碌,越来越被榨干的感觉就是资本主义通过加速发展的技术,让人们越来越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他们被资本主义加速的车轮裹挟着前进,没有休息时间,没有自主的娱乐,只有随着工作任务和业绩考核的增加不断地抽搦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成为电脑旁边或流水线旁边做着简单和毫无意义工作的行动体(agent)。由于实际上的从属,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他们不再是劳动或工作的主体(subject),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节奏,也丧失了自己作为生命体的独特韵律。那里只有机器般的塞壬歌声,只有机器和自动化算法的韵律,我们的身体只有在随着这些自动化韵律的节奏运动时,才是存在的,而资本主义从算法系统中抽取每一个身体的能量和灵魂,促成了喀迈拉式的新产品。ChatGPT不过是这种喀迈拉式的产品最新体现形式而已,在ChatGPT背后,是无数为这个通用语言模型提供语料库和数据库的抽搦的身体。

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的从属,就是一种生命政治的生产。它生产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与资本主义自动化和智能化机器之间的从属关系。哈特和奈格里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及其不断扩张的机制所产生的生命政治的效应,在《帝国》一书中,他们指出:“当实际上的从属可以被视为裹挟着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也裹挟社会的有机体和生命本身,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规训和控制的方式,就会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的单向度和极权主义的形式。”^{[5]273}由此可见,智能资本主义时代下的云计算、数字化、智能化

与人类劳动之间的关系,已经不纯粹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通过实际上的从属概念,通过马克思、哈特、奈格里等人的分析,它已经成了一个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生命政治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上,不再只是资本家从某个劳动个体身上榨取了多少剩余价值,而是个体的劳动和生命如何“嵌入或松或紧的层层网络里”的生命政治问题。

二、作为能量的身体与资本主义生产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谈到了监狱里的囚犯的劳动。处于监狱中的囚犯,并不拥有外面世界中工人的所谓“自由”,他们的劳动也不纯粹是为了获得谋生和养家糊口的薪酬,而在监狱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福柯看到,在监狱里的囚犯,通过全景敞视监狱和教养系统,不再是离经叛道的“不正常的人”(des anormaux),而是实际上从属于监狱规范制度的个体,所以福柯明确指出:“那么,犯人劳动的价值是什么?不是利润,甚至也不在于培养某种有用的技能,而在于建立一种权力关系,一种空洞的经济形式,一种使个人服从和适应某种生产机构的模式。”^{[5]273}不难看出,福柯将监狱视为一种生命政治的模型,这种模型也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模型,也让现代资本主义得以良序运行的基本方式。这是一种颠倒的逻辑,与惯常的看法不同,并不是人们进入了文明社会,才发明了监狱,将不文明和不正常的行为纳入监狱体系,恰恰相反,在市民社会诞生的模板中,从一开始就是按照监狱的规训和监控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经过监狱的规训程序,按照固定规范行为的囚犯个体,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巨大装置不停歇运转的动力来源,所以福柯继续说道:“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5]349-350}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实际上的从属”,与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的监控和规训模式是一个道理,即整个资本主义模型,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前资

本主义的框架,原先在农田、作坊工作的农民或学徒,绝不是直接变成了现代工厂里的工人和雇员,他们经历了一个生命政治生产的过程,即通过规训和监控,让他们的身体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这个情况下,监狱——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隐喻,就是一个巨大的以工人身体为基本元素的装置,而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不仅仅需要打破传统农奴制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也需要创造一个规范的被驯服的工人身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实际上成了整个资本主义概念的模型,监狱和犯人只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一种隐喻,实际上这个隐喻影射了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崛起时期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来自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能量假设,亥姆霍兹指出:“对于上个世纪的自动装置的建造者来说,人和动物就像一个从未上过发条的发条,并凭空创造出他们所施加的力量。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消耗的营养和产生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然而,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在蒸汽机中辨别机械力的这种起源,我们就必须问一问,对人来说,类似的东西是否也是有效的。”^[6]亥姆霍兹这个比喻非常有趣,这个比喻延伸到了1738年法国科学家雅克·沃康松(Jacques Vaucanson)的可以模仿消化运动的机械鸭子。在亥姆霍兹看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人是一个未上过发条的发条,并能够创造出独特力量的存在者,他们的价值仅仅在于实现了从个体营养消耗到生产产品之间的过渡,而此期间的产出,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我们从这些机械主义的工程师的眼中来思考人与机器的存在,人的身体并不是一个有着生命力和灵魂的活的存在物,而是一个类似于能量的东西,也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不是形态各异、思想多元的人类存在物,而是一种机械化并拥有能量的身体,这些身体不仅能够产出,而且不知疲倦、不会抱怨,也不会有任何不满,他们在大机器旁边,成为一个运作者或算子(operato-

tor),让机器像一个不停歇的车轮一样永远运转下去。如果将亥姆霍兹和沃康松的看法,与马克思的“实际上的从属”概念和福柯的“规训”概念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必然现象,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实现了将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解放出来,但资本主义制度生产了另外一种依附,这种依附就是机械化的规训身体相对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巨大装置的依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需要的不是像艺术家一样的具有灵韵的身体,而是一种被规训,简单还原为能量或劳动力的身体。这种身体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身体的巨大贬低,身体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物理-化学能量的储存体,在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中,这些储存的能量才能被释放出来,成为源源不断服从于机器大生产的源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看到的,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中,那种被转化为能量的工人的身体形象,他指出:“对于那些像亥姆霍兹一样,从工业发电机的角度掌握宇宙的秘密的人来说,生命等同于力,而力是支配宇宙的生理-化学原理。‘生命’被重新定义为不是指机械运动,也不是指任何与生命有关的东西,而是指推动所有自然界的普遍运动力量所采取的特殊形式。”^[7]

这样,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时候,人类的身体被一分为二。人们发现,在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被启蒙思想祛魅的不仅仅是宗教,同时被祛魅的还有人的身体。在启蒙理性之下,作为神的恩赐的人类身体,已经丧失了其全部的奥秘,通过哈维的《血液循环论》,通过法国解剖学医生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人类的身体彻底被还原为物理-化学运动,正如意大利左翼思想家费代里奇十分敏锐地指出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发明实际上就是对身体的贬低,“尽管身体作为主角出现在哲学和医学的舞台上,但这些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身体的贬低。……在解剖学家的眼里,身体是一个工厂,正如维萨里给他划时代的‘解剖工业’著作起的标题:《人体的构造》。机械哲学通过将身体类比为机器来描

述它,并常常强调其惯性。身体被认为是蛮横的物质,完全脱离了任何理性的品质:它不知道、不想要、没有感觉。身体是一个纯粹的‘器官集合’”^[81]^[87]。费代里奇的叙述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在于现代启蒙思想对身体的机械化描述,而是他认为身体存在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以能量的方式存储在身体里。这就好比说,一旦工人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薪酬,在资本主义工厂里消耗的不是身体本身,而是身体里储存的能量。所以在资本家看来,他用工资购买的从来不是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类,而是在人类身体中存在的通用的能量,他们在生产中消耗的也是这种身体的能量。不难看出,人格和个性这样的高贵的概念,在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身上是不合适的,他们没有个性,没有资格讨论尊严,他们就是能量的储存体,换言之,工人的身体被异化为一种物质性的能量,而工人身体对资本主义的有用性也恰恰在于这种能量。一旦这种能量消耗,就需要通过社会再生产来进行补给(如饮食、睡眠、消费),进入资本主义交换的身体是作为能量的身体,相反,被掏空能量的身体就是无用的身体。所以,费代里奇指出:“工人自由地异化自己的劳动,或直面自己那将作为资本交付给价高买家的身体——此类形象指的是已经被资本主义工作规训塑造的工人阶级。”^[81]^[82]这样,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下的身体的二元性就在于,机器生产需要的是作为能量的身体,不需要无用的身体;需要规范的身体,不需要恣意的身体;需要的是随着机器韵律而运转的身体,不需要与生产格格不入的身体。

作为能量的身体,是生命政治概念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概念,破除了一种假象,即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是对某个具体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在机器化的大生产下,其实已经很难分辨一个产品是哪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而哪个工人应该为某个产品承担责任等等。事实上,通过福柯和费代里奇的作为能量身体的假设,我们看到,工人的身体绝不是原封不动地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身体被

一分为二,参与到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中最有用的部分是作为能量的身体,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机器生产的赘余。设想一下,在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一个被轧断腿的工人,由于丧失了劳动力,即作为能量的身体,他变成了无用的身体,于是,他会迅速地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抛弃,被资本家开除。在亥姆霍兹的能量物理学的世界观里,工人之所以对于机器化大生产有效用,恰恰在于他们在生产中异化为能量形态,参与到机器生产过程中。那么,真正为资本家谋得利润的,不再是单纯的可变资本的活劳动,而是活劳动与不变资本的结合体,一种巨型机器(mega-machine)的运转。作为能量的身体,在现代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下的命运就是芒福德的告诫:“自动化的社会控制一旦装配完毕,谁也无法拒绝接受它的指令。或者插入另一更新的指令。因为从理论上说,巨型机器不容许任何人背离它的完好标准。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人和自动化体制都有的致命缺憾:这种虚拟的体制为保障自身顺利运行,须由同样虚拟的人来操控它。”^[9]

三、机器奴役与算法剩余价值

作为能量的身体的生命政治概念,试图作出这样的回答,工人仅仅作为可变资本或者活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种活劳动的不断再生产的基础上。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内正确,因为让工人的身体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劳动的前提是,工人的身体以劳动力的形式进入到机器化大生产之中,与机器生产过程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并不是具体生产出哪一个商品,并将剩余价值体现在个别商品的价值量上,而是工人身体的活劳动,即作为能量的身体,与机器运转相结合,形成了巨型机器,这样剩余价值才能被生产出来。这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问题,机器或者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否能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今天的 ChatGPT 之类的人工智能的地位,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时代的机器,它们仅仅作为一种不变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起作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引入一系列新的概念。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正好遇到了这个经典的问题。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处的时代是高度自动化、电气化生产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蒸汽革命的时代有一定的区别,不过,问题是一致的,例如当时的法国学者毛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就质问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有人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问题,他不太明白,在承认机器也‘劳动’或生产价值、机器一直在工作、机器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与人成正比的同时,如何能够保持人的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¹¹⁰¹²⁷⁶为此,德勒兹和加塔利特地发明了一个概念——“机器剩余价值”(plus-value machinique)。什么是机器剩余价值?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于,德勒兹和加塔利使用的机器,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不是一回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谓的机器是一种寂静的无人化的机器,在没有人操作的时候,这些机器的确不会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即便参与到机器生产之中,它们也只能以折旧和磨损的方式偶然地展现其在生产中的作用。这种寂静的、不依赖于人的机器,当然没有剩余价值,它与人分离,也不可能进行生产。但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往往会忽略一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机器,人的身体也无法变成劳动力,无法变成能量,无法生产出资本家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因此,在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作为分离的量来考察的,剩余价值只能出现在活劳动中,即工人出卖生产力的部分。但在工厂里的实际情况是,工人一旦进入车间以及流水线,白领一旦坐到电脑旁边开始敲击键盘,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活劳动,机器也不再是单纯的机器,而是一种被作为能量的身体所激活的机器,作为能量的身体也从此实际上从属于生产过程。于是,新的机器诞生,也只有这种被活劳动激活的机器,才能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利用,才能

生产出资本家所希冀的剩余价值。换言之,工人不是以独立的个体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而且他也不是以完整的身体生产出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身体必须异化为能量,能量激活了机器,才能生产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理解的机器的装配。简言之,机器产生剩余价值的条件是:(1)工人身体异化为能量(生命力);(2)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被激活,这样可以获得(3)真正的生产机器,只有机器(3)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这就意味着,机器(3)不能脱离于作为能量的身体(1),机器剩余价值的核心仍然是人的剩余价值,但人类的劳动力,即能量将人与机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边界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了,那么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人类的劳动并不在于人类身体活动本身,而是与机器一起运转的解域化劳动,机器剩余价值建立在这个解域化的劳动之上,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说:“在解码流动的地方,以技术和科学形式出现的特定代码流动受到一种适当的社会公理的制约,这种公理比所有科学公理都要严厉得多,也比所有已经消失的旧代码和过度代码都要严厉得多: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公理。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在科学和技术中‘解放’出来的代码流产生了一种机器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并不直接依赖于科学和技术本身,而是依赖于资本——一种附加在人类剩余价值之上的剩余价值,它纠正了人的剩余价值的相对还原,两者构成了作为该制度特征的流动剩余价值的全部。知识、信息和专业教育与工人最基本的劳动一样,都是资本(‘认知资本’)的组成部分。”¹¹⁰¹²⁷⁹

由于这个机器(3)并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机器,而是被工人的生命力激活的机器,这样也反过来产生一个问题,即工人通过马克思的“实际上的从属”,不得不参与到剩余劳动时间之中,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不存在个体生存的空间。那么,为什么个体的身体一定要参与到机器之中呢?这是因为在当代生命政治机制的规训下,个体已经成了一种隶属于机器生产的主体,用意大利自

治主义思想家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说法,是因为工人已经深陷入一个全新的奴役过程,拉扎拉托称之为“机器奴役”(machinic enslavement)。换言之,一旦机器(2)被劳动力或作为能量的身体激活为机器(3),那么主体就陷入机器奴役之中,拉扎拉托的说法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作用于主体性的方式之一。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和对主体性的完全不同的掌控——‘机器奴役’会被叠加到个性化的主体或人的生产上。与社会主体性不同,机器奴役是通过调动功能性和操作性、非再现性和象征性的符号学,而不是语言性和代表性的符号学来实现消除主体性的过程。”^[11]不过,相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处的自动化和电气化时代,拉扎拉托已经生活在数字化的今天,在他谈到机器奴役的时候,他头脑中浮现出来的机器肯定不是福特汽车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而是今天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化设备构成的无形的全球行星规模的大型数据交换和运算的机器,这个机器不仅奴役着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奴役着每一个使用着智能手机和电脑的个体,通过这些终端设备,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数据流参与到这个新的巨型机器之中。与马克思时代作为能量的身体不同,今天我们的身体不仅是能量,更是数据,唯有当我们的行为与实践,被智能终端设备转化为数据时,我们才能参与到这个全球行星规模的巨型机器的运算之中。正如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谈到拉扎拉托时,迅速想到了他的机器奴役概念更适合的范围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自动化时代,而是今天的智能化和数据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沃克说:“机器性奴役作用于前人类的、前认知的、前语言的情动,以及超个体的情感。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大数据,它一方面处理的是碎片化的数据流,另一方面要应对庞大的聚合体,它们对于确定主体是次要的。”^[12]

这样,与那些主张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形成剩余价值的核心是大众的“认知”(cognition)的认知资本主义^①潮流不同,奈格里、拉扎拉托、沃克实际上都

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下一种新的机器的产生,这种机器产生了全新形式的机器奴役,这种奴役已经将参与其中的人搅碎,变成碎片化的数据,通过各种服务器、中继器、处理器和各种接口,被衔接到一个巨大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之中,在这个机器中,人类数据和非人类数据已经被搅拌在一起,生成了非意指关系的聚合体,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哈拉维的说法是:“这种全新的聚合体内爆了实体,成了密集的物质符号的‘聚合体’,即本体异质性构成,历史上确定、物质丰富,各种关系激增的清晰的字符串(string figures)。”^[13]这样,资本主义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劳动个体,甚至不是人类本身,在今天的数字产品中,如ChatGPT这样的通用语言大模型,以及未来的智能环境下的自动驾驶,甚至智能城市,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产品的物质载体,而是背后巨大的数据库和语料库生产出来的智能运行的结果。我们很难区分这些语料库和数据库中的数据,哪些是人类数据贡献的,哪些是非人数据贡献的,况且这种区分也没有任何必要,因为这些数据共同生成了智能时代的数字产品,并为所有的公众提供数字化的智能服务,未来数字资本主义的盈利大部分都是由这些看不见的数字网络和智能计算构成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数字时代的剩余价值的产生,我们完全可以仿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器剩余价值的概念,提出算法剩余价值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将自己的身体异化为劳动力或能量,激活机器(3),从而产生可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剥削了工人,而且他们的剥削直接来源于被作为能量的身体激活的机器(3)。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资本和大数据公司无偿占据了这些具有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也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器剩余价值进化为算法剩余价值。这样,所谓的算法剩余价值,并不是源自个体化的工人异化为能量并与不变资本的机器(2)的衔接,而是所有的用户,通过智能终端将自己异

化为数据,并与已经高度智能化的行星规模的计算衔接在一起。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于这个被用户数据激活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不断地析取和分析数据,并将其作为某种产品和策略输入,产生巨大的利润空间。那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台不断运行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运作的根源,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向其输送数据,让其不断蚕食,并让控制着这台算法机器的资本家富埒陶白、贯巨程罗。

总而言之,通过机器奴役和算法剩余价值的概念,让人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平台资本是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中获取超额利润的。它并不是源自对雇佣关系下的工人和雇员的剩余价值的直接剥削,而是让所有使用数据和平台的用户变成其机器奴役的部件,让其永远随着行星规模的算法去运转,向其不断地喂食数据,同时又使其成为这些数字产品的消费者,不断地让数字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在所谓产消者(prosumer)的概念下,将所有的人类用户磨成数据的齏粉,并搅拌在诸多非人数据之中。这个过程将是数字资本不断地获得算法剩余价值的奥秘所在,也只有洞悉了这个奥秘,才能思考如何在公共性层面,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正义的智能社会。

注释:

①比如认知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奈格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就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型的。当然,信息以及信息转化为知识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关注的中心”。参见奈格尔·思瑞夫特《认识资本主义》,闫婧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参考文献:

- [1]卢克莱修.物性论[M].李永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8.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3.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0.
- [4]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理论批判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1.
- [5]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6]Hermann von Helmholtz. über die Wechselwirkung der Naturkräfte und die darauf Bezüglichen neuesten Ermittlungen der Physik[M]. Populär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Bd. 3 Braunschweig: F. Vieweg, 1876: 125.
- [7]Anson Rabinbach. The Eclipse of the Utopias of Labor[M]. No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7.
- [8]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M].龚璿,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
- [9]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M].宋俊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89.
- [10]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M].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 [11]Maurizio Lazzarato.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M]. Joshua David Jordan, South Pasadena, trans. CA: Semiotext(e), 2014: 25.
- [12]麦肯齐·沃克.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M].姜昊骞,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93.
- [13]Donna Haraway. Awash in Urine: DES and Premarin in Multispecies Response-ability[M].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2012, 40(1): 301.